

独角兽回归与新经济崛起

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 首席经济学家 程实



66 凭借“信息三优化”的根本机理，新经济能够在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需求侧提高居民福祉，因而内嵌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中，兼具时代动力和比较优势。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2018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独角兽企业回归中国资本市场的步伐大幅加快，中国新经济的未来走向备受市场瞩目。我们认为，新经济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经济形态，而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对传统经济金融体系进行的一场系统性大改造。凭借“信息三优化”的根本机理，新经济能够在供给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需求侧提高居民福祉，因而内嵌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中，兼具时代动力和比较优势。

以此为基础，利用中国存托凭证(CDR)等制度创新，独角兽企业的加速回归将构筑中国新经济崛起的正向循环，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领跑。有鉴于此，以2018年为起点，中国新经济将步入全面崛起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追根溯源，新经济是一场系统性大改造。今年“两会”以来，随着政策红利的相继发布，叠加独角兽回归中国市场的进程提速，新经济正在走向新时代中国经济的舞台中心。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概念，新经济具有不断丰富的内涵和模糊变化的外延。如果仅从其外部表现进行事后性的总结归纳，在范围上会挂一漏万，在时效性上会刻舟求剑。例如，如果仅将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等同于新经济，那么既忽视了其对线下经济的深刻重塑，也限制了对新经济发展空间和演进路径的预判。因此，需要从根源本质和动态视角出发，对新经济进行理解和前瞻。

本质而言，新经济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经济形态，而是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对传统经济金融体系进行的一场系统性大改造。其核

心标志在于，信息数据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要素资源，并对传统要素发挥关键的引导作用。其根本机理在于，通过全社会的“信息三优化”，产生新红利并重塑经济金融体系。

第一，信息处理的优化。以大数据、云计算和量子计算为核心技术基础，大幅拓展信息处理的量级、范围和深度，从海量信息中挖掘新联系和新规律，进而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第二，信息流动、信息优化。**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量子通信为核心技术基础，实现高效、安全、精准的信息传输，进而驱动各类要素资源突破传统产业格局，实现跨界融合与混合经营。**第三，信息利用的优化。**以人工智能、VR/AR等技术为基础，提升信息要素对人本身的服务效用，将人从低级职能中解放出来，并增强人的高级职能和感官体验。

新经济的红利，动态地产生于这三重优化之中：推动科技进步和扩散，改造产业体系，进而形成新产业；优化信息利用，改造经济运行链条，进而孕育新业态；引导要素配置，改造资源整合方式，进而催生新商业模式，最终在每个时点上形成静态的“三新经济”。

由于“信息三优化”的普适性，虽然目前新经济发轫未久，但未来并不会局限于某个行业或领域，更不会被定义于某个“新旧经济分界线”，而必将渐次深入当前经济金融体系的每一个层面，进行深刻而细致的大改造。这场改造接近完成之际，就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爆发之时。所以，新经济是上一轮信息技术浪潮的再发展，更是新一轮产业革命以及人类技术“奇点”的前奏曲。

聚焦时代，中国新经济内嵌于高质量发展之中。以十九大为起点，中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一历史性转变正在为新经济的崛起注入强劲的时代动力。正如我们此前研究所提，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特征是“两个提高”。凭借与“两个提高”的紧密联系，中国新经济的崛起内嵌于高质量发展之中，并形成了显著的国际比较优势。

在供给侧，新经济进行双向发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信息三优化”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信息流引导要素流动，打破市场扭曲，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并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例如，共享经济激活了闲置社会资源，网约车削弱了地域性行业垄断。而在普惠金融领域，基于大数据而非抵押品的征信体系，降低了小微企业融资门槛。另一方面，以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发力点，充满活力的新企业纷纷涌现，有望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化和扩散。学术研究显示，新企业的大量进入能够推动科技创新，最终抬升行业总体生产效率，并且这一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显著。

在需求侧，新经济实现“两降一升”，提高人民福祉。从需求质量来看，“信息三优化”降低搜寻成本，精准匹配市场供求，有效适应消费升级的高端化、个性化和多元化趋势。例如，AcFun、Bilibili 直击 90 后 ACG 亚文化群体，而快手、抖音等 APP 则满足了不同人群的碎片式、体验式娱乐需求。

从需求广度来看，“三新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支持偏远地区和中低收入群体获得更优质的消费和就业机会，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红利、抑制社会阶层分化。例如，2012 年以来，随着大城市市场趋于饱和，中国电商企业着力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市场扩张，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渗透率增长。

根据学术研究，此举产生了所谓的“阿里巴巴效应”：即使考虑了对线下零售的挤出作用，电商的进入依然实现了当地居民总福利的净增长；并且在越小的城镇和越偏远的农村，这一净增长越强劲。从购买力来看，新经济一方面推动科技进步和扩散，压缩高端消费品制造成本，一方面创新商业模式，以关注度取代货币作为交易新对价，从而为广大普通消费者提供免费的信息产品和服务。这些

变化提升了居民单位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全面巩固消费升级动力，广泛地改善社会福利。

内嵌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潮，中国新经济有望充分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形成领先全球的比较优势。从外在特征看，“三新经济”市场广阔。中国不仅具有海量的总体市场，还基于区域、城乡、阶层、文化等多样性，形成了层次丰富、需求多元的细分市场，为各种新经济的创新提供了先试先行、百花齐放的肥沃土壤。不仅国外引入的模式在中国繁荣壮大，中国本土的原创模式也正在成为全球标杆。例如，2017 年，中国在维持互联网市场总量全球第一的同时，其共享经济实现 47.2% 的同比增长，总量已占全球市场的 44%，其移动支付普及率高达 77%，位列全球第一。

从内在动力看，“信息三优化”基础优越。在新一代科技浪潮中，中国基础科研和商业应用首次实现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同步出发，并已经位于世界前列。据 WIPO 统计，2017 年中国提交 PCT 国际专利的申请量已升至全球第二，增速为全球最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现状，以及亟待进一步完善的市场机制，凸显了传统经济金融体系的内在短板，为新经济的系统性大改造提供了施展空间。十九大以来，伴随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政府规制渐次转向负面清单制、后置监管和综合监管，亦有利于新经济红利的释放。综合而言，上述两方面的比较

优势有望激活新经济的中国加速度，以新经济的领跑领跑，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弯道超车。

独角兽回归，打造新经济崛起的正向循环。作为一场系统性大改造，新经济的发展蕴含难以估量的广阔前景。内嵌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新经济的崛起兼具时代动力和比较优势。作为这一趋势的直接反映，方面，中国新经济培育出了数量可观的独角兽企业。截至 2018 年 2 月，在 Crunchbase、CB Insights 等国际机构的独角兽榜单中，中国企业总数均位列第二，紧随美国之后。

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市场亦给予了独角兽企业全球领先的价值评估。例如，2018 年 2 月 18 日，三六零安全科技公司从美股回归中国资本市场，公司市值增长逾 6 倍。由此，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创新，引导海外上市的独角兽企业回归中国资本市场，那么将打通上述两个方面，构筑“独角兽—资本市场—新经济”的正向循环，支撑中国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步，资本市场加速独角兽成长。得益于中国市场对新经济的偏好，回归后的独角兽获得更充裕的资本加速自身发展。

第二步，独角兽带动新经济崛起。独角兽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出众表现，一方面将发挥信号旗的作用，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本向新经济的倾斜，另一方面促进资本市场的多元化繁荣，激发居民财富效应，扩大中国市场对新经济的需求。

第三步，新经济培育更多独角兽。随着新经济加速发展，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将充分显现，进一步打破传统经济的利益藩篱，从而在破立之间创造更多的独角兽，开启新一轮正向循环。2018 年 3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允许境外注册的独角兽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推出中国存托凭证(CDR)，并围绕创新企业的盈利情形和公司治理特征进行针对性制度安排。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率先享受试点红利。有鉴于此，独角兽回归的步伐正在提速，“独角兽—资本市场—新经济”的正向循环有望在年内形成。因此，我们认为，以 2018 年为起点，中国新经济将步入全面崛起的新阶段，并将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 [上接 A1 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述评

■ 李云 李银娟 陈多多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攻关期，面临着上一阶段国家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副作用，即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差距大、收入分配结构不平衡等问题，特别是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充分利用国家既有的双边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针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需求提出不同的合作发展战略，既能有效带动沿线偏远省区的发展，又能将我国富余的投资投向海外，“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增速转换、结构优化和驱动转变，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效供给，特别是优质增量供给，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创新举措和有效途径。我们的创新举措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否定，我们的发展思想仍是以人民为中心，但毕竟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是在一百多年前，我们必须紧跟社会的发展脚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提出有利于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做出了最初的阐述，他提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的思想，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方法。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具有新内涵、新理论和新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肖林认为，与供给侧改革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提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针对生产要素领域、企业生产领域两大领域的实践探索，这一探索也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探索。国家要在立足于实际的基础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根本上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供新要素供给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二是减少政府干预，实现政府职能向市场配置的转变，用好“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创新制度以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三是在产业结构上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化发展，减少无效产业和低端产业的供给。四是着力优化短期市场环境，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时间和环境，以政策新供给来化解中国短期集中出现的重点问题。五是在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注意需求侧的管理，解决供需不均衡的问题，确保供需两侧有效协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战略机遇。顾海良、王天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多方面有建设和发展：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三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四是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五是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理论。

我国发展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直到现在取得的巨大成功，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同志在十九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报告中贯穿了坚持新发展理念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思想，指出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下，坚持科学发展，在供给上满足人民对消费品更优质、更安全、科技含量更高、更全面性的要求，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因此，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总结是对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涵，深刻理解和把握当代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特点和基本趋向，驾驭新常态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新发展，是未来我们研究的第一要务。

四、《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2 年习近平同志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时指出：“《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

的光芒。”并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上再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要把《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结合。2017 年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 150 周年，众多学者对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探讨。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逢锦聚认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指导作用，而不是借鉴。此外他还提出，《资本论》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根本立场、根本方法、基本原理、重要范畴以及重要借鉴。邱海平认为，要构建科学严谨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必须深入研究和正确理解《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关系，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地对《资本论》加以继承和发展。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问题。刘凤义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方法；二是怎样运用方法论的思想贯彻劳动价值论；三是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学，首先就涉及我们现在的初级阶段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一个问题。程恩富认为，《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指导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规律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都要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研究方法，即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二是《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为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层面和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需要科学提炼并上升为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新理论；三是《资本论》包含若干科学揭示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的概念体系，主要包括劳动概念体系、资本概念体系和剩余价值概念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为核心概念，全面构建创新的理念体系；四是《资本论》的主要任

务是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规律和运行机制，有适合任何社会的一般理论，又有直接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用理论，还有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需要拓展的理论，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运用《资本论》方法论，构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理论。

可见，学术界对《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基本达成共识，《资本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思路各异、论证表述不一，但也强调了两方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比当年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更为丰富多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有许多创新与创造，但这些创新与创造一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工具，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所形成的科学认识。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概念界定不清。陈清认为，现有研究存在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一是现有研究较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概念的界定，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重要概念的界定还存在欠缺；二是一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内涵，但是仍然不够准确，需要从学科发展历史和理论溯源的角度深入探讨一些重要概念，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胡洪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全新的领域，目前在理论性、实证性、关联性及学界的参与面上还有待实现突破和拓展，主要表现在相关理论体系的研究还较为粗浅，以及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联性缺乏清晰界定。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问题。宫宁认为，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政策解读层面，而忽略了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理论分析多采用宏观论述而未研究精细化、微观化，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史的持续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系之间的研究比较少；现有成果缺

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太过单一化，缺乏政治-经济-哲学层面的综合研究。王立胜认为，当前的体系构建工作还没有摆脱相对松散的学术体系特征，其主导的体系逻辑还具有很明显的问题导向性，要兼顾学术规范性与内容完整性，可以围绕当前经济学“中心基础理论+分支应用学科”的学科架构展开，简单来说，这个构建过程可以概括为“先做减法，再做加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问题。周文认为，要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需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问题。西方经济学体系不断完善成熟，我们也需要提炼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建设。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付诸更多地努力与行动，专题式地研究，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张宇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不能满足时代与实践的要求，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不少难点问题有待说明；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理论和实践脱节问题突出；三是学科基础薄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地位还有待增强。因此，必须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强化理论基础，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奠定其学科地位。

总之，综合学术界研究观点，认为目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存在有关概念界定不清、理论结构与体系存在一些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迈向了新的阶段。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的研究，丰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结合新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致力于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所在。(完)